

#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的体现

李易宁

**摘要**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也不例外。在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中,对教育的重视与民族主义的观念成为他接受与宣传西方“文库”的基础。福泽谕吉的西方“文库”见闻通过《西洋事情》传播于日本,形成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文库”印象。此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记录为福泽传播于日本的“文库”印象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强化了福泽的“文库”印象。福泽谕吉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政府职责,以及日本近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演变为国粹主义后要求公共图书馆所具备的思想善导功能,都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到体现。参考文献 24。

**关键词** 福泽谕吉 公共图书馆 文库 日本

---

## Reflection of Fukuzawa Yukichi's Modern Views in Japanese Modern Public Library Undertakings

Li Yining

**Abstract:** Fukuzawa Yukichi's modern view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 and also on the Japanese modern public library undertakings. In Fukuzawa Yukichi's modern view, the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became the basis of his acceptance and propaganda of the western "library". Fukuzawa Yukichi's western "library" observation spread in Japan through *Western Things*, which formed the original "library" impression. Since then, the Yancang Diplomatic Delegation records added more details to "library" impression and reinforced the "library impre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odern public library undertakings, we can fi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dvocated by Fukuzawa Yukichi, along with thought guidance demand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odern times when social views transited from nationalism to quintessence of Japanese culture. 24 refs.

**Keywords:** Fukuzawa Yukichi; Public Library; Library; Japan

---

### 1 引言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日本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之下迫切需要寻求出路,在看到西方的先进与发达之后,渴望效仿西方而实现自己的近代化。福泽谕吉的启蒙、岩仓使节团的出访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在文明开化与发展国力的迫切需求之下,福泽谕吉意识到图书馆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精英个体的培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民众基础的建立

上——这两点对一个近代国家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福泽谕吉开始,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思想中已然形成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在大众教育方面的等同认识,进而引入图书馆经营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方式。这些在此后岩仓使节团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明确,并在日本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以实现。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2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与日本近代“文库”印象的初定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福泽谕吉,福泽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福泽认识西方之“文库”的观念基础。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其对西方事物的认识与推介对日本近代社会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 2.1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

福泽谕吉心怀日本复兴与近代化的目标,学习西方见闻之先进事物,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事一物。福泽对近代的基本认识与观念决定了其宣传西方经验与倡导日本近代化的基本立场,也对日本近代化的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福泽的振兴教育以培养日本近代之民众的观点奠定了其认识近代图书馆的功能的基础,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对日本近代社会理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 2.1.1 福泽谕吉的教育观

福泽推崇英国的立宪政治,将其视为19世纪政治体制应具有的一般形态,19世纪唯一有效的政治体制。已经蜕变成“蝴蝶”的19世纪的人民与“青虫”时代的人民不同,既不能“以指撮之”,也不能“以箸挟之”,像法国拿破仑三世、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德国俾斯麦那样的专制,再也无法压制已然成为“蝴蝶”的人民了——这就是福泽对19世纪的理解<sup>[1]</sup>。福泽谕吉对于19世纪的认识,表达了他对受教育的平民与国家建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在对平民的“高度”期待之下,福泽大力倡导通过教育途径改变平民的地位,以此提高国力。他尖锐地批判了“日本只有政府而没有国民”的状况,讴歌“独立自主”和“一身独立”的自由主义理念。他认为人生来平等,但是学业修行的层次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提出一个国家真实的力量不在于政府,而是取决于每一个国民的学力综合构成<sup>[2]</sup>。

可以说,福泽谕吉所执着的立宪政治和培养高水平国民的追求,深刻表达了对于建立日本近代之市民社会、以强大的精英力量推动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夙愿,这就是福泽谕吉理解图书馆与图书的社会功能的起点。

#### 2.1.2 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观

陈秀武<sup>[3]</sup>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中包含了民族主义的“开化性”与“狭隘的民族性”的双重特点,其中“开化性”决定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消极意义。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同时他又将“爱国心”和“自私心”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为宣传蛊惑的工具,而走向民族自私的一面。

这种民族主义与其后来提出的“脱亚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构成了福泽谕吉学习与介绍西方经验的基本立场。基于民族主义的“开化性”,福泽谕吉从一开始便将“文库”视为西方世界中用以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利器。而狭隘民族主义的消极面在这一阶段也埋下了伏笔,随着日本近代前期全盘西化的终结、复古思潮与国粹主义极端化的兴起,始于近代前期的用以实现民族振兴的“文库”逐渐转化为“思想善导”的工具。

### 2.2 福泽谕吉的“文库”印象

#### 2.2.1 “文库”印象的来源

福泽谕吉一共参加了三次幕府末期的遣使出访,分别是1860年、1862年和1867年。万延元年(1860年),德川幕府派遣使节团出使美国,福泽谕吉作为咸临丸号军舰奉行木村喜毅的随从随行前往。这次美国之行,福泽谕吉最主要的收获是在旧金山买到一本《韦氏辞典》和一本《华英通语》。文久二年(1862年),福泽谕吉作为幕府遣欧使节团的雇佣翻译,随行出访了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罗斯、葡萄牙等欧洲六国,留下了旅行日记《西航记》及见闻概要《西航手帐》,并在

英国和荷兰购买了大量英文书籍。最后一次是在庆应三年(1867年),幕府派遣勘定吟味役小野友五郎为委员长的使节团前往美国购买军舰,福泽谕吉再次随行出访美国,又购买了不少英文书籍。后两次欧美之行所购得的书籍,成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重要资料来源<sup>[4]</sup>。

此后,福泽谕吉在自己三次出访西方国家见闻的基础上,结合所购得的大量西文书籍,从庆应二年(1866)至明治三年(1870)间编译出版了《西洋事情》,共三编十卷,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诸多方面<sup>[4]</sup>。正因为信息来源的可靠与行文的生动,《西洋事情》成为明治时期有识之士了解西方的极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与其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见闻相比,福泽谕吉的出访在先,其对西方世界的见闻主要是概念层面的,正如石井敦等所述: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使日本人了解了关于“图书馆”的概念<sup>[5]</sup>。

### 2.2.2 关于“文库”运营的整体印象

在《西洋事情》一书中,福泽谕吉对公共图书馆的描述并未占用太多笔墨,但却在日本近代形成了生动而深刻的“文库”印象。《西洋事情·初编》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文库”,篇幅很短,与学校、报纸、医院、博物馆等事物并立为西方近代国家的特有事物进行罗列和描述<sup>[6](39-40)</sup>:

西洋各国的都府中都有文库,被称为“bibliotek<sup>①</sup>”。其中的收藏从日常使用的书籍图画到古书和珍本,各国的图书皆收入其中。人们可以到这里来任意阅读图书。但是仅允许每天在书库内阅读,不允许将图书带回家。伦敦的文库中有八十万卷的书籍,彼得堡(俄罗斯的首都)的文库有九十万卷,巴黎的文库有一百五十万卷的藏书。法国人说,如果将巴黎文库的藏书一字排开,总长度可以达到七里。

有的文库为政府所有,有的文库为国家一般民众所有。外国出版的书要通过购买获得,本国出版的书则由本国的出版者向文库提交一本来

收藏。

这段描述中包含了有关文库运营方面的5项重要信息:(1)文库的馆藏可以是日常生活用书,也可以是珍本善本等珍贵的藏书;(2)一国之文库的藏书不拘于一国之出版的图书,还可以有外国的出版物;(3)文库向一般民众开放,但只可以阅览不可外借;(4)本国图书的呈缴本制度;(5)文库的两种类型:归政府所有或者归民众所有。

### 2.2.3 “文库”的教育功能与政府之责

在《西洋事情·外编》和《西洋事情·二编》关于国家、人民和教育等主题的章节中,福泽从教育的视角探讨了关于“文库”的话题。在整体印象的基础上,从“文库”的教育功能考虑,分别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从而完善了福泽本人与日本近代社会对公共图书馆的印象。

在社会教育方面,《西洋事情·外编》第二卷《政府的职责》中提到了政府在民众教育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其中就包括要建立“文库”。福泽认为图书馆具有教育民众的文明开化作用,“其他国家中建立的书库、开设的植物园、建设的博物馆和开设的游乐园等等场所,都在开化人民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更应该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大的助力”<sup>[6](167)</sup>。而政府行事的基本方式就是利用税费,即“政府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制造经费呢?必然来自于国内的税费。换句话说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sup>[6](155-156)</sup>。因此,从教育的角度考虑,开办图书馆成为政府的责任。

在学校教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为了开办学校,就必须购买设备和图书,还需要建筑校舍。这些都是需要投入很多资金的事情”,这些费用如果由民众来投入,则会造成“除非是有钱人,否则很难入学来接受教育的局面”<sup>[6](275-276)</sup>。因此,学校教育应该由政府出资兴办。“政府筹办的学校教育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有钱

① 原文为“ビブリオテーキ”,“bibliotek”为“图书馆”的拉丁文。

人受教育的需求,而应该确立专门为贫民中有志于学业而缺少学费的人提供福利”,所以“提供教学所必须的用品(书籍、设备、校舍等)就成为了政府的基本职责”<sup>[6](275-276)</sup>。

### 3 岩仓使节团见闻对福泽“文库”印象的强化

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对图书馆的介绍是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传入日本的一个极为重要、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思想源头。此后使节团的出访见闻对福泽的观点一方面起到了印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发展与延伸的作用。

在学习西方的客观需求和历史背景之下,以“求知于世界”为目的,1871年12月岩仓使节团出发访问欧美<sup>[7]</sup>。岩仓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约50名使节团成员、50名留学生<sup>[7]</sup>。其成员在构成上几乎包含了明治政府的各个部门,且以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全体出动”。各位成员本着学以致用务实态度,详细记载所见所闻<sup>[8]</sup>。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形成了两份记录,其一是以使节团的名义形成《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一书,其内容除了所见的欧美机械工业、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情况之外,也包括图书馆。其二是岩仓使节团中的教育专员田中不二麻吕主持编修的《理事功程》,其中有针对欧美诸国的教育状况和图书馆的专门记录。

岩仓使节团在福泽谕吉之后出访欧美,将“文库”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之一,对其馆藏范围、借阅方式、管理方式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记录,从而强化了福泽谕吉的基本的“文库”印象。

#### (1)“文库”的馆藏范围

岩仓使节团非常重视馆藏的问题,在图书馆等同于博物馆的印象之上<sup>[9](137)</sup>,又加入了与档案馆的对等认识<sup>[9](109-110)</sup>,提出了馆藏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涵盖百科之书、百家之言”,并且提出“在信息的获取中,世间没有废物”的观点<sup>[10]</sup>。

#### (2)“文库”的借阅方式

岩仓使节团考察到大英博物馆<sup>[9](109-110)</sup>与瑞士的书库采取凭证借阅的方式<sup>[11]</sup>、以及法国巴黎大书库的复杂闭架借阅模式<sup>[12]</sup>,这些见闻都没有涉及外借服务,从而强化了日本国内对图书馆使用方式的基本印象。

#### (3)“文库”的运营方式

岩仓使节团的考察中发现,法国的巴黎大书库依靠政府提供税金维持,且向读者收取借阅费<sup>[12]</sup>。田中不二麻吕介绍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图书馆采取征收人头税的方式<sup>[13](34-35)</sup>,德国的文库社依靠政府提供经费、并向读者收取费用<sup>[13](610-611)</sup>,在美国还存在社会团体主办的公共图书馆<sup>[13](34-35)</sup>。由此,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运营问题,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形成了由如下要素组合而成的印象——以税金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来源,并向读者征收费用,可以由政府主办、亦可以由民间力量主办。

#### (4)“文库”的教育功能

田中不二麻吕的《理事功程》专门从教育的视角考察西方的图书馆,因此对其教育功能格外重视,且有所偏重。石井敦等认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并没有突出强调对图书馆的利用,而是将重点放在书籍的保存方面,甚至不曾体现出将图书馆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而田中不二麻吕的《理事功程》一书,则很到位地发现了公共图书馆的本质<sup>[14]</sup>。

岩仓使节团的见闻对“文库”的细节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记录,包括馆藏范围、借阅方式等等。同时,田中不二麻吕从教育视角考察西方,探索“文库”的教育功能,从而使这一观念在使节团的见闻中得到了切实的肯定与强化。此外,使节团记录了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以税收支持图书馆运营的情况,成为福泽所主张的政府负有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责任的例证。

## 4 近代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初现与发展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强调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与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中的

责任。在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福泽的近代观也得到了长期的坚守与体现。

## 4.1 近代初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初现

### 4.1.1 官办图书馆——政府责任的体现

文部省开设于东京的书籍馆是日本政府主办图书馆的先驱,也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前身。关于东京书籍馆建立的情况,可以从市川清流的《书籍馆建设之仪附文部省出仕市川清流建白书》中有所了解<sup>[15]</sup>:

择府内临街的清净之地,建造一个大书院,室内四周摆放数个书架,收集各种类型的书籍,分门别类摆放于书架之上。允许平民到馆阅览,以供其考古证今或著述编辑之用。这正是人才培养之本、国力增强之源,见证了宋太宗所言之“开卷有益”。

在倡导“公开”的基础上,市川清流明确提出了模仿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建立图书馆的设想<sup>[15]</sup>,并明确了允许阅览、不允许外借的借阅制度。在这些基本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日本近代官办图书馆初登历史舞台,体现了政府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中的职责。

### 4.1.2 私立图书馆——福泽谕吉近代观的集中体现

京都集书院于明治五年(1872)依据福泽谕吉、榎村正直、大黑屋太郎右卫门的设想建立于京都(现中京邮局附近),也可以简称为“集书院”<sup>[16]</sup>。这一私立的集书院同样被视为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早期形式。从业务类型和经营特点来看,集书院不同于官立的公共图书馆或者传统意义的图书馆、文库或集书院,而是介于江户时代的借书屋与今日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中间形态<sup>[17]</sup>。从社会的需求来看,集书院除了承担过渡时期的借书屋业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教育的功能<sup>[18]</sup>。

明治五年(1872)发布的《集书公司总则》,以西方的通常做法作为集书院运营的依据<sup>[19]</sup>:

在西洋各文明国家的城市中都设有文库,称之为“bibliotek”,其馆藏范围从日用书籍图画到

古籍珍本皆有,收藏各国的书籍,以供人们随意浏览阅读。

从主办方来看,集书院应属于私立机构,但也存在民间力量与政府协作的成分。依具体计划来看,集书院以书商与政府配合,通过借书屋的方式首先解决馆藏问题,并在京都府推进派的支持下,在馆藏发展、公司建立等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集书院建立的初衷就是建立京都府的公共图书馆<sup>[20]</sup>。集书院基本上是依照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所描述的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形态建立的,是福泽谕吉的近代观较为集中的体现。

## 4.2 近代中后期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自1880年前后起,日本逐渐从由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的浪潮中抽身而出,在全盘西化的尝试中,照搬西方社会的种种近代制度与日本未经历“近代化”却自上而下建立起“近代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不适用”造成的矛盾之下,经历了西方文明压制的日本精神与自我意识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出来,国粹主义、自由民权运动与皇权至上成为这一阶段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种新的客观约束力中,依据西方经验照搬而来的公共图书馆逐渐被塑造成为适应于日本社会的形态。福泽谕吉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发展到了国粹主义的阶段,公共图书馆成为“思想善导”的工具,被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之中。

### 4.2.1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定位

在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始终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机构,这与日本近代效仿欧美国家建立教育制度的做法有关。欧美诸国早期建立的社会教育机构中,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基本上都是私立机构,不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并且大多未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支配。因此,明治政府虽然要求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文明开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其纳入教育行政的直接管辖范围之中<sup>[21]</sup>。

随后,以田中不二麻吕随岩仓使节团出访为契机,田中在《理事议程》中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日本于明治十二年(1879)颁布的《教育令》第一条就提出开设“书籍馆”<sup>[22]</sup>,这些因素成为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育范畴的直接原因。

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之中,一方面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公共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小的外部环境,使其在事业的发展 and 思想的延伸方面受到“社会教育”划定的外延的影响。日本近代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而立,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为主要内容,因此在经历了文明开化后的日本近代,在国粹主义极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文明开化”的利器转而成“思想善导”的工具。

#### 4.2.2 思想善导功能的强化

近代中后期,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从文明开化转变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社会教育展现出日益明显的重要性,进而,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也变得极为重要<sup>[23]</sup>。里田武夫指出,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国民思想的健全化”之外,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内容<sup>[23]</sup>,但“国民思想的健全化”无疑是其中的主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教育与栖身于其中的公共图书馆都不可摆脱其外围的、统治阶层的需要,因为这一需要才是促使两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石井敦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史的研究》中也提出了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结果与主导力量之间的关系<sup>[24]</sup>: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图书馆的发展在健全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sup>①</sup>的指导下得已推进。但是如日本这般基本不存在“健全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国家中,图书馆必然转化为支持教化政策的机构,从而导致民众的反抗,最终成为形同虚设的慈善机构。

在日本近代建立而成的公共图书馆与日本自上而下的近代性如出一辙,在行政管理与规则方面受到统治阶层意志的约束与左右。这也是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近代中后期的国粹主义的体现。

## 5 小结

福泽谕吉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通过《西洋事情》向日本社会传递发达的西方世界的印象,兴起于西方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也在其中。福泽描绘了一个馆藏包罗万象、严格限制外借、建立呈缴本制度,可归政府所有或者归民众所有的“文库”的印象。这一印象中包含了福泽谕吉所追求的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基本观念——教育观与民族主义观。因此,福泽强调当时被称作“文库”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与政府责任。这些与福泽的近代观一同包容于其“文库”印象与主张中,并在后续岩仓使节团的记录中得以强化,也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得以呈现与坚守。由此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日)坂野润治. 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 1871—193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80-83.
- 2 山脇直司. 试论东亚地区的“世界—地域”性: 公共哲学的构想[M]// 黄俊杰, 江宜桦编. 公私领域新探: 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7-26.
- 3 陈秀武.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00-201.
- 4 郭丽. 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 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16-217.
- 5 石井敦, 前川恒雄. 図書館の発見 市民の新

① 原文为ブルジョアジー, 对应法语“bourgeoisie”, 中文对应为“资产阶级”, 日语中还有“市民阶级”的含义。

- しい権利[M]. 東京: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73: 82.
- 6 福澤諭吉. 西洋事情[M]. マリオン・ソシエ, 西川俊作, 編. 東京: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9.
- 7 解晓东. 岩仓使节团及其对日本现代化的意义[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68-71.
- 8 袁灿兴. 岩仓使节团与日本的近代化之路[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67-70.
- 9 久米邦武. 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 第2篇英吉利国ノ部[M]. 東京: 博聞社, 1878.
- 10 久米邦武. 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 第4篇欧羅巴大洲ノ部 中[M]. 東京: 博聞社, 1878: 391-392.
- 11 久米邦武. 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 第5篇欧羅巴大洲ノ部 下[M]. 東京: 博聞社, 1878: 84.
- 12 久米邦武. 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 第3篇欧羅巴大洲ノ部 上[M]. 東京: 博聞社, 1878: 52-53.
- 13 田中不二麿. 理事功程[M]. 東京: 文部省, 1877.
- 14 石井敦, 前川恒雄. 図書館の発見 市民の新しい権利[M]. 東京: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73: 85.
- 15 市川清流. 書籍院建設ノ儀. 二付文部省出仕市川清流建白書[M]//小川徹, 山口源治郎 編著. 図書館史 補訂版. 東京: 教育史料出版会, 2003: 34-35.
- 16 京都集書院[EB/OL]. [2018-06-02]. <https://ja.wikipedia.org/wiki/京都集書院>.
- 17 西村隆. 丹波亀山深海氏二題[J]. 立命館文学, 2012(1): 772-780.
- 18 石山洋. 源流から辿る近代図書館[M]. 東京: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15: 34.
- 19 角家文雄. 日本近代図書館史[M]. 東京: 学陽書房, 1977: 47.
- 20 京都域粹 69号『京都集書院』書林から近代的書籍商へ[J/OL]. [2018-06-24]. [www.kitatouhoku.com/kyoto/documents/ikiiki69.pdf](http://www.kitatouhoku.com/kyoto/documents/ikiiki69.pdf).
- 21 田代元弥. わが国社会教育制度の改革について[J]. 横浜国立大学教育紀要, 1966(2): 1-21.
- 22 小笠原正.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法制[J]. 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1983(3): 1-11.
- 23 裏田武夫. 明治・大正期公共図書館研究序説[J]. 東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1965(8): 153-189.
- 24 石井敦. 日本近代公共図書館史の研究[M]. 東京: 財団法人日本図書館協会, 1971: 37.

(李易宁 副研究馆员 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17-11-17